

当代理论经济学三大源流的 哲学基因剖析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要:当代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三大类,即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哲学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理论,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抽象人性论假设是其理论原点,由此衍生出其效用理论的主观唯心论。凯恩斯经济学是以社会再生产的货币流程为中心的理论,把社会理解为再生产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其理论原点,由此衍生出其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这些哲学基因决定了它们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先天不足,这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所证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因则是唯物史观,集中体现为作为物化劳动的社会关系思想、市场权力结构与资本逻辑,以及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的思想。理解这种哲学上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责难也就烟消云散了。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基因;旧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6-0005-08

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土壤上生长出的经济学理论不胜其多,而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又分为众多的流派,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两类:新古典主义流派和凯恩斯学派。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经济学大体上可以归源为三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100多年来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1]。此论并不周全,因为似乎没有把熊彼特等非主流学派包括其内,但就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来说,这种归类是有根据的。

那么,同一社会经济现实的土壤之上,为何能够产生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除了现实的社会原因之外,其学理上的原因,乃是因为各种经济学理论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乃是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分析、整理与组织的精神基因,人类思想的DNA,由此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生长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找出这些理论背后的哲学基因,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些理论的本质,由此发现它们之间相互争论的实质,从而判别出它们的是非曲直。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因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由此产生的抽象人性论成为文艺复兴后的主导思想,而其中直接影响经济学理论的是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功利主义。在这种个人主义文

收稿日期:2015-08-17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AZD066),项目负责人:鲁品越。

化土壤中,占主流地位的哲学乃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及相应的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它成为近代占主流地位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乃至自然科学理论)的哲学基因。

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思想是“看不见的手”和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其中的劳动价值论,而继承了其中立足于个人自利的“看不见的手”,并且把人的自利发展为对于利益的“边际分析”:行为者每一时刻都在计算其下一步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得的“边际收益”而决定其经济行为。由这样的哲学基因生长出来的典型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理论,可作如下最简略的概述。

(一)理论主线: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及其结果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于19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部均衡理论的成熟形态。马歇尔将经济学定义为关于人在财富方面的行为的科学。^[2]其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其具有支配权的资源约束下尽其最大可能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于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具体化为下述两个层次:

第一是个体层次的“边际均衡”状态。理性经济人将其经济行为分解为一步步行动单元,当采取每一行动单元时,行为者都对其所获得的收益增量(边际收益)与所付的成本增量(边际成本)进行比较,使每一步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直至二者相等的“边际均衡”为止。在此基础上,再研究各种因素的变化(如价格、收入等等变化)所引起的边际均衡点的变化特征,得出各种关于这个边际均衡点的弹性(需求弹性、供给弹性)理论。用此分析各类经济行为者的行为,于是得到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要素供给者理论等等。

第二是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市场均衡状态。在处理“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通过交换他们各自的可支配资源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由此趋向于局部均衡的“帕累托最优”——各方达到其资源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状态。而在英国与法国,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关于均衡状态理论,其原因是二者不同的哲学基因。

市场中各种个体力量之间的局部性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原理”,它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具体形式。这是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典型表现。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强调个体经验的基础地位,最后嬗变为强调个体经验而否认客观物质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它所讲的商品“效用”沦为纯粹的主观感受,它从消费者角度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而法国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基因,却引导人们去思考各个个体之间的局部均衡所产生的总体社会经济结构。从整体市场结构来看,局部均衡理论的缺点在于:每种产品(或要素)的局部市场均衡,又必须以其他产品(及要素)市场已经实现局部均衡从而形成了“既定价格”为前提,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计算出该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进行边际分析。这样一来必然陷入逻辑循环。那么是否存在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一般均衡”?法裔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以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态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到了著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在一个以自利作为经济行为动力的虚构的社会中,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企业家追求最大利润,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追求最大报酬。在没有套购的情况下,每次每种商品的拍卖人同时喊价,由此产生出人们的购买行为而导致一种市场供求状态。拍卖人为了实现最大利益将调整商品价格而作出新的喊价,由此会趋向于全社会各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状态。瓦尔拉斯进一步用数学证明了这种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3]这一理论典型地表现了法国理性主义的哲学基因。熊彼特对这一理论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伟大理论以水晶般明澈的思路和一种基本原理的光明照耀着纯粹经济关系的结构”^[4]。瓦尔拉斯的理论在数学上还不够严密。后来经过从瓦尔拉斯到阿罗、德布鲁的一系列理论努力,终于证明:在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下,通过大规模讨价还价过程,全社会市场可以趋向于“一般均衡态”,但这必须在一个没有股市、没有企业破产、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影响的

经济体系中才有可能。^[5]

(二)核心问题:社会是个体集合,还是社会关系结构?

这种以“个体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通过复杂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学界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理论,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唯一正确的经济学。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一套理论只是毫无价值的“黑板经济学”,其数学模型已经远离社会经济现实。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与评判这一理论?

首先,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利益最大化”假设具有表面上的合理性。由于利益最大化问题本来就是数学上的求极值问题,所以新古典经济学通过数学来表达也就不足为怪了。应用“理性经济人”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分析人们在市场中的买卖行为,分析价格与产品的买卖数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了一系列围绕市场价格的规律,如价格与销售量关系的规律(需求曲线)、价格与市场供给量的关系的规律(供给曲线)、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和交叉弹性原理、围绕市场均衡价格波动的规律(蛛网模型)等等,这些规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现象近似,从而为产品定价和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根据。

然而,这些肤浅而粗略的规律只是表层现象的近似规律,而非经济现实的深层规律,只能近似解释复杂市场现象中的某一类表面趋势(例如均衡趋势),而不能解释市场中的其他趋势,特别是长期的、深层的历史趋势。而市场规律本身则是各种不同趋势相互纠缠的复杂的“过程的集合体”。当人们进一步寻问:这里的“最大利益”到底从何而来?既然每个人都能从市场得到最大利益,那么为什么市场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趋于两极分化?对于这些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理屈词穷了。这说明,这种表面看来合理的理论,其内部蕴含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是什么呢?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批评中,有三种批评比较流行。一是认为其主要缺陷是把每个人都说成是“自私”的,而忽视了“利他”,例如母爱子,见义勇为等等。因而企图用“利他主义”假设来批评与替代“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假设。但是这种批评至多只能减少“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而不可能替代这一理论。这实际上只是用一种抽象人性论(利他主义)来反对另一种抽象人性论(利己主义),二者具有同等性质的错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个具有某种固有本性(利己或利他)的原子式的个人集合体。二是有人批评“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认为人们常常被非理性情绪所支配,因而应当研究“非理性经济行为”。三是有人批评即使人是自利的,也不具备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所要求的理性能力和条件,例如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不能作出精确的理性计算等等,因此只能利用“有限理性”来获取相对较大的利益。这些批评有正确之处,但都没有击中要害:因为这些至多只能限制新古典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而不可能提出替代性理论。实际上,只要奉行个人主义哲学,认为社会经济体是由一个个作为原子的个人组成的,我们就无可避免地要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无可避免地对利益与成本进行“边际分析”,从而无可避免地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问题不是“利己”还是“利他”、“有限理性”还是“无限理性”,而是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立场问题:社会是作为“原子”的个体的集合体,还是由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系统?经济学规律来源于原子式个人的固有本性,还是来自社会关系结构?

如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把社会经济体看成是“原子式个体”的集合体,人的本性决定着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了经济行为的规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表面看来是“平等的”的“原子式个人”的背后,存在着个体之间活生生的深层内在联系过程,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深层内在联系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使各个“原子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而拥有各自不同的资源、权力和地位,由此产生了他们各自可能实现的利益空间,决定着他们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的各种可能的方式,从而产生了社会经济规律。这才是经济学规律的真正根源。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

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6]这就是说,个人的自利产生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它将个人的自利心纳入到增进公共利益的轨道。这一思想可谓惊世骇俗,震惊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因为霍布斯提出过人的“自利本性”会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由此形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那么,同一“自私”本性,为什么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呢?这是一个笼罩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迷雾。

实际上,假设社会上每个人都只是单纯地“自私自利”,而不考虑给他人的利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霍布斯丛林”。真正能够从理论上产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市场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分工结构!因为分工使人们劳动生产的是供他人使用,并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交换的目的是“自利”,但其一旦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那么就必须“利他”,即向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己”的目的。因此“看不见的手”的真正秘密正是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结构。

另一方面,市场要真正实现所谓“看不见的手”,必须平等地付出与他人提供给他的相等的劳动。然而,由于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每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不平等,从而形成了大资本支配小资本、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关系格局,使这种等价的利益交换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而是优势方侵占了劣势方所创造的利益空间。总之,把社会看成原子式个人的集合,忽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当代转向:从个体到个体间社会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根本缺陷,使它与经济现实格格不入,从而不得不自我突破,形成了战后这一理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转向,出现新兴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等等,姑且称之为“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转向:产权与交易成本。“科斯定理”指出,理性经济人在计算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时,必须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同时要计算交易成本。在产权明晰和交易成本等于零的前提下,外部效应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而实现帕累托最优。这是对理想的市场(即“看不见的手”完全起作用的市场)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现象性规定。然而现实的市场并不符合这一规定,因而并没有得到帕累托最优配置。这一理论使经济学理论的重心,从分离的原子式个人向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与交往成本转移,客观上是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的靠近。然而它回避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根源,仍然只是“理性经济人”概念向人们的交往过程的延伸。

信息不对称转向: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7]指出,人们需要通过委托他人工作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而代理人处于信息优势,于是产生了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来侵占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不仅使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失灵,也使企业和政府中的命令链关系失灵,由此产生了产品市场的逆向淘汰和履约的道德风险,并且引起了优质代理人向委托人发出“信号传递”以避免被逆向淘汰、委托人向代理人发出“信号甄别”以区分优质与劣质代理人的行为。这也是理论重心从“原子式个人”向社会关系的转移,是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接近。然而其同样没有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根源,从而只是“理性经济人”概念的延伸,仍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之内。

博弈论转向:人的行为的利益相关性。博弈论指出,理性经济人在计算自身利益时,必须把他人的行为也作为自己的利益函数的自变量。其中纳什均衡理论提出:当每个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由于他的行为影响他人利益,将会害人又害己,不但得不到最大利益,反而使他人和自己得到最不利的结果。这其实是从人们利益关系行为上对“原子式个人”假设的突破。然而,由于没有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的真正根源,仍然停留于现象层次,是“理性经济人”概念在现象领域里向社会关系

的延伸。

这些理论突破已经从“原子式个人”向社会关系领域转向与拓展,是不自觉地向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靠近。然而,它们所讨论的社会关系仍然只是现象领域中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各种表现现象,而没有从本质上、总体上分析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生根源。因此,它们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延伸,“理性经济人”假设仍是解答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因而其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流派。

二、凯恩斯经济学的哲学基因

凯恩斯经济学的哲学思想贡献,在于指出了社会经济现象并不能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中得到解释,因为社会整体会对人的行为做出限制,使其不可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更大的思想突破。而凯恩斯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突破,是由于他确立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主线。

(一)从失业问题到再生产的货币流量

凯恩斯关心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个体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的问题,因为萧条的社会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闲置生产要素,资源稀缺性已经不再直接构成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他最关心的是大萧条中经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失业问题。边际分析理论认为,社会就业量是由对劳动的边际分析决定的: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的均衡状态决定了社会的总就业量。然而这种理论与事实相冲突。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迫使凯恩斯要寻找决定社会就业量的新因素。他发现了下述循环过程:“货币以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的形式从企业流入社会;当社会大众购买商品、消费劳务时,这些钱又回流企业。只要企业卖出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并获得满意的利润,这一过程就会维持下去。”^[8]如果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入再生产的货币流量缺乏,将导致缺乏推动生产要素进入再生产流程的运行动力而产生失业。于是凯恩斯以再生产的货币流量作为他的理论主线,创立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流派的新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

(二)理论主线:社会再生产的货币流程

那么,投入到再生产中的货币流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此前公认的经典理论是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因为社会卖出总量一定等于买入总量。凯恩斯分析了对萨伊定律的各种论证,发现他们的分析以“物物交换”为前提,“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像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9]在这种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情况下,“卖”的同时也就是“买”,所以供给必然等于需求,萨伊定律乃是公理。而货币发明之后,“卖”与“买”相分离,供给与需求之间在数量上与时间上便有了差别,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货币除了交易功能之外,还获得了独立于实物交易的存储、借贷、生息、投资、投机等由实物交易衍生而来的功能。于是在社会实物生产与交换系统之外,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货币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不是进行实物生产,而是提供推动社会实物再生产系统的社会动力。于是社会的实体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实物生产和交换部门(产品市场),二是推动实物生产的社会动力系统——货币流通系统(金融市场)。凯恩斯证明了:在独立的货币系统出现之后,人们的经济行为遵循“凯恩斯三定律”:货币的储藏功能诱导人们进行储蓄而减少消费,由此产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使投入消费的货币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资本的生息功能使投资付出了机会成本,由此产生了投资行为的“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定律”,它决定了投资总额的界限;货币的投机获利功能决定了储蓄利率的下限,由此产生了储蓄行为的“流动性偏好定律”。三者的总结结果是:社会生产的总供给流量中只有一部分投入需求(消费与投资)而进入再生产流程,其他部分被储存起来而退出再生产流程,造成部分再生产流程无法继续。而能够再生产出来的实际产值(总供给)由那些转化为需求的货币流量(有效需求)

所决定,它小于由劳动的负效应所决定的总供给(它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最大可能产值),二者之差构成“有效需求不足”,它等于从社会总供给中分流到货币系统中的货币流量。

于是凯恩斯发现了产生失业现象的新机制——这就是由货币系统的分流效应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它直接导致社会再生产流量不足。这个缺口所对应的就业量,就是“非自愿性失业”的数量:即在劳动边际收益大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情况下的失业。这种失业显然是“利益均衡机制”所无法解释的,而且“社会愈富,则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差别愈大”^{[9]30}。

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既然市场机器必然会发生货币流通量不足所导致的停滞与衰退,因此必须依赖市场外部的政府力量将那些未能通过市场投入再生产的货币注入市场中,增加社会经济系统的货币流量,给社会再生产提供动力。这就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或“财政主义”。凯恩斯进而证明:政府投入的初始流量可以带动社会的闲置货币投入市场,产生更大的货币流量,由此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推动市场机器的运行。此即所谓“乘数效应”:“即总需求之增加,乃等于总投资增量与乘数之积,乘数则定于边际消费倾向”^{[9]106}。

因此,如果说经典学派发现了“边际利益均衡机制”(“看不见的手”),那么凯恩斯则发现了“货币流量的动力机制”。此机制由“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国家干预主义”与“乘数原理”三者所构成,这是凯恩斯的主要贡献,而货币系统所引起的再生产流程中货币流量的变化则构成了凯恩斯理论的主线。

(三)思想突破:从个体利益到社会整体流程

上述分析使凯恩斯发现了有别于“个体利益均衡机制”的经济机制——社会经济再生产整体流程的“货币流量机制”。凯恩斯并非哲学家,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并不明显,所以后来的“两个剑桥学派”就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本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实质上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包含的两个基础假设。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哈佛大学的“剑桥学派”(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的剑桥镇),其奉行的仍然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理解凯恩斯,因为凯恩斯在分析人们的消费、投资和储蓄行为时仍然使用边际分析原理得出“凯恩斯三定律”。萨缪尔森由此认为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并不矛盾,从而力图建立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统一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但这只是凯恩斯理论的一个方面。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就业数量的分析中摒弃了对利益的边际分析,强调货币流量的总量分析——社会再生产总体流程决定社会的就业总量。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倾向于强调凯恩斯理论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反对用边际利益分析来解释商品的价格现象,而用社会全部商品的再生产流程的货币流量来解释商品的价格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斯拉法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社会商品的再生产过程实质上是“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流程,货币是组织商品再生产流程的手段。与新古典经济学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公理不同,斯拉法把“再生产条件”作为其理论基础,这就是每种商品的产出所得的货币必须大于其投入所花费的货币,由此决定了全部商品的价格体系。“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交换价值即价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原,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10]这套价格体系能够确保任何商品的总产出所具有的价值大于或等于其投入的各种商品的总价值。其超过的部分就是“剩余”,即简单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可以溢出的剩余商品。由此可见,新剑桥学派的确继承了凯恩斯对货币流量的分析传统,将“社会再生产流程可持续进行的条件”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用它取代边际利益分析来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虽然凯恩斯理论中的确保留着一部分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的思想因素,但这只是用来作为证明他的理论的工具。而由此得到的他的理论本身是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这就是对于货币体系所引起的货币流量从社会再生产流程退出的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再生产的货币流量对社会就业现象的影响。这种从“个体利益”到“社会总体货币流量”的飞跃,是西方经济学划时代的伟大进

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继承凯恩斯主义本质性思想因素的是“新剑桥学派”,而不是“新古典综合派”。

(四)哲学基因:机械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写了《经济哲学》一书,试图讨论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论述了形而上学、道德与科学的差别之后,她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将意识形态和科学区分开来”,并且从科学性上分析了劳动价值论面临的四个难题(劳动的范围、工人素质的差异、实际工作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异、当年的劳动价值与历史上积累的劳动价值的折旧),从而倾向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11]28、49-51}她接着以科学性为标准,更猛烈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效用价值论。她对“效用”与“幸福”的数学量度的“伪数学今天仍然大行其道”,由此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毫无结果”,“如此脱离现实”,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两个原因:一是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无关紧要,二是以均衡概念为主导。^{[11]78、81-82}接着她讨论了凯恩斯革命,其核心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资源都被闲置,凯恩斯将此情况诊断为资本主义机制高度失灵”,甚至提出“私人(勤俭持家的)美德就是公共恶德”。凯恩斯打破了由人们心理学因素导致的对自发的均衡机制的“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提出废止自由放任,用公共权力手段干预市场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11]85-86、91}他们以再生产流量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解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由此反对寻找在此之后的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其哲学思想是把社会经济系统看成一部作为整体的再生产机器,而不像新古典主义那样着迷于对个体行为的分析。这种世界观具有整体论唯物主义色彩。它排除了价值与价格背后的一切“形而上学”含义(劳动或效用),而只讲价值与价格本身,因而在认识论上奉行的是当时哲学界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

这些哲学基因,既决定了凯恩斯主义与新剑桥学派所取得的成就,也决定了它的缺点。因为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货币为什么具有决定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状况的力量?货币流量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关系有何联系?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揭开这些问题的谜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社会再生产机器运转动力的奥秘,以及这部机器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哲学上的优越性

马克思在创立了划时代的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之后,自觉地用新的哲学观念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创立了自觉地体现他的哲学思想的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理论,其主旨正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根源与历史趋势。其哲学上的明显优越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拜物教,指出商品价值与货币的本质是市场中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仅仅看到交换过程中物与物的关系,其由“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所决定,而不理解物仅仅是价值的载体,而不是价值的主体。马克思把这种观点称为“拜物教”。凯恩斯比新古典主义前进了一步,把市场看成用货币流通体系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机器。那么货币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凯恩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自觉地将唯物史观贯彻到对社会经济现实的分析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分工条件和市场交换条件下,社会劳动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时时刻刻生产着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价值。^[12]这种价值通过物化形式而成为一种支配人类历史活动的物质力量。这是市场结构中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化劳动的社会关系,他随着其物质载体的不同而不断获得各种表现形式:以出售的商品为载体表现为作为“交换能力”的“交换价值”(或交换权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要素为载体则形成“资本权力”。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3]

第二,克服抽象人性论,发现市场经济权力和资本逻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抽象人性论的“理性经济人”来解释经济现象,其根本缺点是忽视了这个事实: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争取其个人利益。撇开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讨论“理性经济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只能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由社会劳动形成的劳动价值是最基本的市场关系。而剩余劳动的物化形态会形成支配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在当代则集中体现为资本权力。资本以物质的形式出现,“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因此,资本与货币的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力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逻辑,深刻地分析了资本的扩张动力及其自我否定。

第三,透过经济表层现象,使其建立在深层的本质联系之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西方经济学只描述表层现象,把现象背后的本质视为“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则从本质到现象逐层清晰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层次结构,从而具有其他经济学所不可能具有的丰富内容与巨大理论魅力。这尤其突出体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自己曾作出这样的自我评价:“我的书(指《资本论》——引者)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二重性(这是对全部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特别在第二卷中表现出来。古典经济学家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15]

上述三条是马克思自觉地立足于其发现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到经济学理论的建构过程,这就是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学思想到资本逻辑、从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劳动到劳动价值论、从关于本质联系与表现形态的辩证法到资本逻辑的表现形态的理论建构过程。由此我们就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种种诘难也就烟消云散了。

参考文献:

- [1] 樊纲.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
- [2]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廉运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1.
- [3] 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M].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56.
- [4] 熊彼特.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十大经济学家[M]. 宁嘉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9.
- [5] K. J. Arrow and G. Debreu.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J]. *Econometrica*, 1954(22).
- [6]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
- [7]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1970:488-500.
- [8] 亨特. 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M]. 颜鹏飞,总译校.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41.
- [9]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徐毓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
- [10] 斯拉法. 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M]. 巫宝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10.
- [11] 罗宾逊. 经济哲学[M]. 安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 鲁品越. 价值新概念与唯物史观新境界[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5-15.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 [14]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2.
- [1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25.

责任编辑 刘荣军